

## 第陸章 結論

美中台三邊關係必須從政策歷史脈絡、三邊互動、以及事件背景來看，任何單一事件的發生與解決必定與這三項因素有直接或間接的關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生存更是緊密聯繫上美中雙方的態度。因此，美台政策互動過程當中，台灣在安全心理上是相當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的，並依此進行各項軍事交流、軍購採買。然而爲了凝聚選票而喊出的公投新憲以及後續的防禦性公投，在過程當中不但讓中國啓動了訂定《反分裂法》的機制，傷害到美台雙方的互信基礎。總統大選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影響，確實必須予以重視。

在回答論文研究目的方面，美中兩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台灣並不被承認是個國家，但仍然以單元行爲者活動於國際社會當中，在外交生存空間上有賴於美國的支持，並且遭受到北京當局的打壓與封殺，中華民國外交確實艱辛，雖有元首外交、過境外交等不同名目的方式出訪，但成果仍極其有限，這十年來的外交國總數均在 25 個徘徊，台灣的國際人格仍是不確定的。另外近來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所發表將以核武攻擊介入台海戰爭的美國本土言論引發軒然大波，中共方面以戰止戰爲理由，美國方面則出售防衛性武器給台灣以維護和平，台灣儘可能的向美國購買武器以維持相對獨立地位，三邊軍事準備工作一直增溫當中，台海戰爭的可能性無法完全避免。

爲了台灣國家利益，台灣領導人的言行必須取得美中雙方的共同信任，這不但是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結構性問題，也是美中兩國身爲常任理事國所擁有的國際地位所帶來的權威性，台灣領導一言一行必須能夠被預測以及諒解。然而因爲選舉緣故，族群、統獨、軍購等議題被操作的結果，爲爭取選票，政治人物往往不顧過去所作承諾，挑動北京敏感神經外，也招致美國反感，陳總統屢次踐踏「四不一沒有」紅線以及「公投綁大選」有其爭取泛綠選民的選舉考量，但偏離現狀的可能性難以爭取美國信任，更不用說北京的一貫反對。另外，由於美中台三邊各自內部政治情勢乃是與時俱進，台北當局在處理兩岸關係的同時，也應當隨時

掌握美中領導層的異動。在小布希總統連任的同時，台北修補與美國共和黨政府的關係與聯絡管道就成為首要任務，在胡錦濤穩固領導核心的過程當中，是要給予其口實以強化軍方對台鷹派勢力，還是要予其寬鬆兩岸環境以利其繕修內政，兩岸和平相處，當有賴領導人的真知灼見。不幸的是，總統大選過程當中的選舉語言與政治造勢總是造成台北與兩大國間的誤會與衝突，甚至因此將美中推成同一邊，得失之間至為明顯。事實上三方均樂見和平局面，一方面美國與台灣著眼於中國的廣大商業利益，一方面中國也願適度配合美國反恐行動以適應國際社會當中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提升國際地位，並爭取發展機預期。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由來已久，也不是短期之內得以解決，近期之內台灣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蕭條與政治亂象，盡快爭取兩岸間的和平共處是全民所願。而兩岸協商在過去已有兩會會談基礎，但止於一中原則，如果能形成「對一個中國原則沒有共識」的共識，配合美方從中穿針引線，美國一方面鼓勵兩岸對話，北京也認知到武力恫嚇或是疾言厲色都無助於改變台灣選舉結果，透過華盛頓可以有效節制台灣的偏離，而台北又一向以美國馬首是瞻，在美國或其他第三地進行協商談判，很可能是兩岸和平共處的契機。

過去柯林頓總統在上海脫口說出「三不政策」後，美國國會隨即以壓倒性的比數通過支持對台安全的決議案，而在李登輝「兩國論」發表時，美國國會不僅一再以決議案方式重申對台灣民主的支持，在當時還有所謂的「台灣安全加強法」，試圖在立法上對柯林頓總統的職權進行限制。國會強大的制約力量，使柯林頓總統在 2000 年中國發表「對台政策白皮書」後，公開主張台灣的未來必須得到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同意才能算數，此間亦符合台灣的民主政治。相對照之下，中國政治的不透明則使得台灣民眾對於統一的前景充滿疑慮。學者認為促使中國大陸政治體系變遷的原因有四：最高領導人對挑戰的特殊回應、中國的對外開放、市場經濟的出現、交通與通訊的擴展。未來迫切需要進行制度調整的為權力繼承與黨的角色，新領導人的目標將是打造一個持久的政治系統，且不會導

致政治與社會的不穩定。<sup>1</sup>而政治系統的穩定有賴於輸入、輸出、反饋之間的平衡，因此政治民主化毋寧是中國政局發展相當值得參考的選項之一，而中國政治民主化將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

由於台灣民主進程的深化，對於現今國家地位與國際定位不滿的聲浪也逐漸湧出，國內的政治主張也讓美國感受到在外交關係與兩岸定位等方面來自中國的壓力，台灣確是一個不滿於現狀安排的非現狀國家(non-status quo state)。<sup>2</sup>2005年2月底扁宋會「十點聲明」<sup>3</sup>，陳總統所主張的三段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台灣前途任何的改變只有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作出最後的決定。」「統一」亦或是「獨立」都是未來可能的選項，也是目前台灣政府對於台灣前途的明確目標。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不斷增長的綜合國力，如配合上其政治體制改革與明顯改善的人權狀況，在國際社會「反獨促統」的輿論壓力下，美國是有可能力促中國和台灣以主權平等的形式結成「邦聯」式的統合模式。

「一國兩制」在台灣在接受度非常的低，從歷次陸委會的民調當中可以看出。<sup>4</sup>走過長期歷史的悲情，塑造了很強的本土意識與對台灣的認同，中共宣稱台灣可以保留軍隊、政府、貨幣、原有制度等等，但台灣必須放棄國號、國旗、成爲地方政府，在目前維持現狀、保有實質獨立地位的兩岸分治狀態下，台灣人民無法接受中共堅持一國兩制。中國如欲在兩岸事務上有所突破與進展，必須要提出一個對台灣有吸引力的方案，也就是給與台灣一個實際國際地位，而不是允諾給台灣原本就已保有的資產與制度。如果中國提出在聯合國上給台灣一個席

---

<sup>1</sup>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21~35.

<sup>2</sup> 楊永明，「台灣民主化與台灣安全保障」，*台灣民主季刊*，第1卷第3期（2004年9月），頁7。有關非現狀國家的討論請參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3), chaps 4 & 5;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3</sup> 此爲「默契法案」，因爲民親兩黨內部均有認同與反對的聲音。

<sup>4</sup> 陸委會副主委游盈隆在「香港主權移交八週年兩岸新局勢研討會」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完全沒有賣點，沒有市場，也沒有未來。參見「一國兩制 在台沒市場、沒未來」，*自由時報*，2005年07月15日，A2版。

位，國際上不會有人反對，大多數成員國都會贊成，甚至是美國可能出現的反對也會受到國際輿論的壓制。中國方面可以減少台灣的離心傾向，而不是如同今年台灣第九度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一般，再度受到中共封殺，並且利用四五月間連宋相繼赴中國與胡錦濤會面當作國際宣傳，連宋訪中負面效應已經浮現。既然胡四點總算能夠承認到兩岸尚未統一的分治事實，也能夠重拾汪道涵的八十六字箴言，這代表了中共對台政策不是沒有調整的可能性，但中共在國際場域上對於台灣的動作是「內外有別」，也證明了現階段中共中央依舊是不得台灣民心的。鄧小平曾說過「如果我們承諾放棄武力，那就永遠不可能統一。」相當程度說明了中共領導人內心對於說服台灣統一的信心是很弱的，台灣方面也應認識到中共中央這部份微妙的政治心理，也就是，越是以軍事力量威嚇，台灣就是在形式上與主觀意願上都更朝向分離的一端移動，雖然北京以不承諾放棄武力為防止戰端的理由，但這「和平舉動」也將台灣遠遠的推出去。無論如何，面對中國施壓，台灣內部應該要團結對外，於全球潮流趨勢下在各個層面不斷國際化並持續提升，國際化是台灣最好的選擇，據以確保台灣安全、增進人民福祉。經由國際化的刺激，台灣的經貿、政治、社會發展才能夠更文明，台灣也才能夠成為國際舞台的積極參與者，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角色。也由於我國參與國際社會的正當性增加，兩岸間的外交互動面臨新的環境，雙方在國際場合的互動，已必需開始學習共存共容的新經驗。外交上的許多爭議，可望降低對兩岸關係的直接衝擊。

另外，軍事自衛能力的強化是談判的後盾，在兩岸社會經貿交流日趨頻繁的前景中，建立足以自衛的國防能力不但能增強我方自信心，更能保障兩岸經貿交流的穩定性。也因為台灣地小人稠，國內市場經濟規模不大，許多產業發展有其限制，台灣應作為開放的經濟體，運用其他經濟體以產生綜合的規模效果，強化以台灣為主體的經濟，整合其他市場資源，才能有效發展經濟，避免在國際經濟環境中被邊緣化。其中三通議題，應該成為我方全球佈局戰略思考的一部分，亦即不是要不要進行三通，而是要如何處理及促成三通，此為涵蓋範圍極廣且高度複雜的作業，如何進行有效的協商，並在考慮國家安全下進行，避免在三通議題

上牽纏過多的政治干擾，使得將來兩岸三通談判上，創造利我之空間。

從蔣經國晚年、李登輝以來所推動的務實外交，雖然效果有限，但也彰顯了更改國號的問題，希望藉以突破重圍。台灣更改國號是北京方面最深的忌諱，不但動搖到中共的威權體制與權力基礎，並在內部無法交待，甚至引發權力鬥爭。從中共的眼光來看，台灣政府往台獨發展的政策路線已十分清楚<sup>5</sup>，且其對於台灣獨立的定義，從反對一中各表到反對台獨，其中空間彈性甚大，台灣過去就在這空間中不斷往前，台灣共和國因此成爲一個底線。美台關係熱絡良好之時，正名制憲時間表是可能排上議程的，但在美台關係低潮的時候，外交上則可進行謀求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更有實惠的行動，以充實實質獨立的內容；兩岸事務上可尋求雙贏和解的統合方案，台灣不願接受中國所提的一個中國原則，北京方面何嘗願意接受台灣所提之方案，質此而言，如果是雙方共同提出、並且獲得公民認同的方案，當可有效轉圜兩岸對峙局勢，由美國主導下的兩岸「中程協議」是爲可行做法。<sup>6</sup>1995年5月前美國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提出兩岸可先就「中程協議」問題進行談判，對兩岸關係應是一種值得推展與思考的方向。陳水扁總統曾表示今、明兩年是兩岸復談的「機會之窗」，願意在「第三國」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坐下來握手、和解、對話。<sup>7</sup>美國政府對兩岸關係緩和，約有下列三點的看法，。一、台海透過任何管道在不預設前提下儘早恢復對話。二、台灣不能將美方的支持用來抗拒與中共的對話。三、兩岸在沒有政治對話的情況下，美國鼓勵兩岸直接三通、人員增加往來、探究「信心建立措施」(CBMs)等雙邊「相互再保證機制」(mutual reassurance mechanisms)的建立。陳水扁總統在2004年間多次主張台灣成立「非軍事化區」、「軍事緩衝區」、「台灣海峽軍

<sup>5</sup> 葛永光，「展望兩岸復談之可能性」，**和平論壇**（台北：歐亞基金會，2004年10月05日）。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307&webitem\\_no=929](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307&webitem_no=929)

<sup>6</sup> 「中程協議」，或稱爲過渡協議interim agreement，是台海雙方在美國主導下進行談判，簽訂過渡協議，於一定時間內以台灣的不獨換取中共的不武。參見黃恩浩，「中共武力犯台與美國干預之可能性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頁57。但反對者認爲，接受中程協議就要放棄台灣獨立。既然台灣放棄獨立，國際社會接受中國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主張，台灣便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沒資格也沒必要在國防上維持外交關係。詳見蔡同榮，「『中程協議』的迷思」，**自由時報**，2001年02月18日，A15版。

<sup>7</sup> 參見王崑義，「兩岸的『和平之窗』」，**自由時報**，2005年02月18日，A2版。

事行為準則」，無非是回應美方的呼籲及著眼於台海和平真正的創造性思考。其實美中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並非只是在台灣問題上，雖然台灣是美國牽制中國的重要因素，但台灣地位在國際現實上並沒有想像中的重要，美中之間存在極多的存異問題，例如：經濟、軍力、外交等問題，在在顯示美中之間藉台灣為較勁的平台，台灣外交走向若是基於短線操作以求取曇花一現的美中關係，則此短視格局已經種下台灣安全的危險因子，不可預知的變數，將考驗台灣安全的鞏固與整頓。美台互動目前最需要的是切實做好基本工作，並溝通彼此的差異，使台灣確立有效的民主自由機制，重建對台灣的國際尊敬與信任是政府外交事務的當務之急。